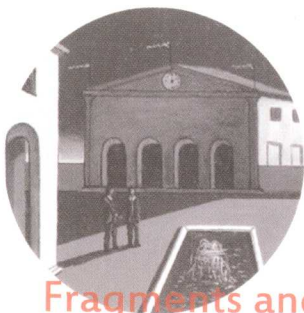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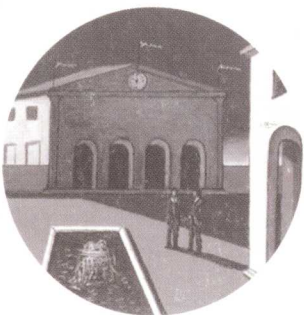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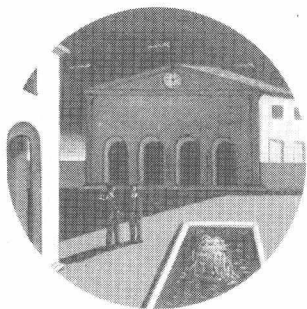




Fragments and Mirroring:

The Twofold Discourse of Comparative
Architecture





邹晖 ——— 著

碎片与比照

比较建筑学的双重话语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碎片与比照:比较建筑学的双重话语/邹晖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建筑新视界)
ISBN 978-7-100-08866-4

I. ①碎… II. ①邹… III. ①建筑学—研究 IV.
①TU-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263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碎片与比照
比较建筑学的双重话语
邹 晖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866-4

2012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½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导论	001
----	-----

一、 比较的建筑理论 019

理论的语境	019
理论的絮语	029
比较的理论力量	039
比较的建筑转译	050
比较建筑学的范畴	060

二、 比较的本体 075

比较的行为与方法	075
指向其他的姿态	087
可比性问题	098
比较的写作	106

三、 比较的建筑史 123

历史的话语	123
中心的消失	135
意义与策略的重叠	147
历史的批判与文脉	164

概念与事件的历史	177
文化的碰撞	192

四、比较的建筑 207

话语建筑	207
类型学	227
其间与事件	239
折叠	252
交叉路径的花园	267

后记	289
----	-----

导 论

这本书的诞生经历了过去的二十年。我于1992年在同济大学的博士学习时开始接触“比较建筑学”这个概念，随后从事相关的理论研究。在那个时候，学界还没有展开对此概念的讨论，也没有既成的理论框架可以依循。我最初的研究目标是想从结构主义的途径建立这个“比较建筑学”的基础框架，于是对当时所能找到的建筑比较研究及相关人文学学科的比较研究成果做了广泛的阅读与分析。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法国，主张特定的文化范畴可以经由某种结构的认定（比如符号学）而达成，它于20世纪8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结构主义后来因其理论的僵硬与非历史性而受到质疑，但其“文化结构”的概念与盛行于中国现代史的科学实证主义的“结构”概念相呼应。仔细想想，这些文化与科学的结构概念恰恰是建立在一个建筑的比喻之上。在经历一番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之后，我对逻辑地因果推论与定量式地归纳出一个理论的框架失去了兴趣，开始怀疑结

构主义的理论途径对建筑本体的有效性。这个认识的转变发生在对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解构哲学的阅读（他本人拒绝接受“解构主义”这一标签）。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我找到两本德里达的英文版著作：《写作与差异》（1978）与《哲学的边缘》（1982）¹。在当时的国内学界，对德里达的阅读刚刚开始，没有翻译与研究成果的出版，但在建筑理论界，西方的解构主义建筑思潮已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我参与了其中相关文章的翻译工作。²解构哲学对西方形而上学二元对立体系的颠覆，极大地扩展了我对“比较”本体中的同与异、此项与彼项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与此同时，解构主义建筑理论的发展，推动了建筑设计对形而上学“大厦”与“基础”这些自笛卡尔以来的经典建筑比喻做出分解与颠倒的尝试。

17世纪的笛卡尔哲学把柏拉图的智性与物性之分上升到主体与客体的绝然对立，并把主体界定为通向神性的唯一渠道，把物质世界贬低至屈从的地位³。这种把世界划分为主客体以及让客体屈从于主体的思想，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近现代基础，使建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理解为主观意志决定论的产品与表象，建筑的物质技术决定论其实也是主观决定论的一个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与杜威的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被同时介绍到中国，大体限定了中国现代建筑在技术世界观引导下的发展格局，使建筑成为现实主义的物质产品。“形式追随功能”的现代主义设计教条在中国现实主义的大环境下显得额外流行，20世纪80年代西方建筑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演变成了古典形式的复古与关于“大屋顶”的持续争论。建筑思想的实证主义与简单化的象征主义（即简单直接的建筑明喻）垄断了建筑设计的方向，使建筑无法在深层次上对人自身的理解做出贡献。德里达关于语言中的隐喻、“比喻的比喻”以及被形而上学所压制的视觉诗意等观点，使我对从解构途径来建构比较建筑学这个课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我从解构文本的阅读中逐渐认识到，比较这个智性的行为是我们长期形成的建立在形而上学二元对立辩证关系之上的

思维模式的代表，如果只是遵循对现有比较研究的分析与归纳，由此所建构的比较建筑学框架无法超越比较项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表面性辩证理解范式，这就如同对太极中阴阳关系的老生常谈式理解。这种想当然的辩证关系，轻而易举地为比较项之间的矛盾或张力找到统一的口头答案，却阻碍了对比较在建筑中的重大意义的发掘。比较的动态张力及其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结构的内在关系，恰恰提供了既内在于形而上学又可能打破形而上学常规体制的契机。对这种契机的追寻正是德里达的哲学路径。

对比较的解构阅读以及这种阅读对建筑可能产生的现实批判意义，是我在国内研究的主题。从1996年至1998年，我对德里达的阅读与建筑比较理论的思考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得以进一步展开。我把那两年的时光投入到对西方现代哲学与当代建筑理论的研修中，尤其把当时所能找到的德里达的英文译本做了逐一阅读。碰巧的是，解构主义建筑师艾森曼（Peter Eisenman）设计的辛辛那提建筑系馆同时被投入使用⁴。整日穿梭在解构的建筑实体与解构的哲学文本之间，这无疑是我的理论思考的理想环境。在此学习过程中，我遇见了哲学老师布莱德福特（James Bradford）。我每学期修一门他的课，他的精彩演讲拓展了我对解构的理解，并认识到德里达所赖以生存的隐藏的现象学传统。这位老师充满激情的演讲总让我想起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中神谕被口述传达的片刻。这段时期我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再阅读延伸出对道家思想的新认识，打开了之后对建筑交叉文化研究的兴趣。在解构阅读之后对现象学的回归让我隐约感到现象学理论与中国诗意传统文化之间的可比性，也为日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跟随现象学历史学家佩雷兹-戈麦兹（Alberto Pérez-Gómez）进行另一段博士学习埋下了伏笔。

佩雷兹-戈麦兹师从建筑历史学家瑞克沃特（Joseph Rykwert）与维斯利（Dalibor Vesely）⁵，主张通过历史的诠释学建立对当代建

筑现实的批判视角与建筑实践的创新途径，这与解构主义理论所主张的非历史性颠覆式形式句法划清界线，提出以现象学的还原发现建筑历史的原初意义，力图将这种原初的历史意义转换成建筑设计中的隐喻生成。现象学的历史研究要求对现象学哲学与历史文本的双重阅读，通过对历史片段的仔细而深层的语义发掘来实现建筑意义的现象学的本质还原。这种理论途径，在建筑师李布斯金（Daniel Libeskind）与霍尔（Steven Holl）的建筑实践中得到展开。佩雷兹一戈麦兹的英文代表作包括《建筑与现代科学的危机》（1983）、《建筑表象与透视的铰接》（1997）以及《建筑在爱之上：建筑对德与美的渴望》（2006）⁶。第一本书是其成名作，该书的理论视角受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与哲学危机”的影响⁷，通过对18世纪法国建筑文本的全面深入的剖析，揭示现代建筑普遍的意义缺失的根源所在。第二本书研究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线性透视在建筑表象中的意义，提出建筑表象不仅仅是形式的表现，而应是人的存在意义的整体呈现。第三本书是关于建筑的德与美的哲学漫游，以古希腊的概念“爱”（eros）作为诠释建筑根本意义的起点。整本书没有插图，展现了纯思辨的心路历程。该书实际上是他在麦吉尔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课程的笔记整理，充分体现了他的独特教学风格与理论追求的高度。这三本书所表达的建筑思想与历史内涵对我的建筑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我选择了清代皇家园林圆明园中的西洋楼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⁸。该论文后来被改写成英文专著《北京的耶稣士花园与中国早期现代文化》（2011）⁹。在这本书中，我以西方线性透视在中国的传播为线索，通过18世纪中西视觉模式的比较，对圆明园与西洋楼的历史文本做了详细的诠释学分析，从而揭示建筑艺术对文化碰撞的深刻含义。佩雷兹一戈麦兹在其书评中写道：“这本书仔细考虑了西方的透视、哲学与神学文本的思想，对耶稣士在中国的作品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诊断，在我看来，这是对包含着异国哲学与神学

兴趣的深层文化境况做出的第一个可信的阐释。该书就中西交流的隐含意义提出了启发性的观点，对这些历史环节的理解在今天全球化的压力下显得极为重要，对正在内化[西方]技术世界观的当今中国文化的复杂状况尤其如此。”¹⁰

从国内时期对比较的解构式阅读到北美时期的现象学历史研究，我对建筑与比较的理解进程始终没有停步，这段研究的经历同时也是我跨越东西方的求学过程，并会聚成对交叉学科与交叉文化研究的兴趣。时隔近二十年后，当我再次阅读当初所写的比较文本时，不禁感叹那四年的思考对我之后的人生道路的决定性影响。现在回首看去，我对当时提出的关于比较建筑学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些观点在我近期的比较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运用。这促使我决定把国内的文本与我在国外的交叉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发表成书，更全面地展现比较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运作。

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建筑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语言学、解构哲学、现象学，以及交叉文化研究的方向。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找到古典建筑符号与语义的关系，但没有认清建筑形式的符号与语义之间的关系远非简单的一对一句法关系，后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沦落成古典形式片断的堆积与拼砌，涵盖不了建筑传统语义的复杂性与生命力。20世纪90年代的解构主义建筑起源于德里达对建筑的接近，他的颠覆形而上学的大厦与基础的哲学愿望，被建筑实践解读为与现代主义形式构成的正反面对抗。但是如同现代主义那样，解构主义与建筑传统的人文主义相决裂，寻求建筑形式的绝对自治，割断了与历史的联系，偏离了德里达既内在于形而上学又颠覆形而上学的双向策略。与解构主义同时并存的建筑现象学坚持人的诗意存在作为建筑意义的地平线，通过历史的诠释寻求建筑意义的本质还原，从而达到对建筑的真理性认识，即如海德格尔所言，建筑是人的诗意的栖居¹¹。建筑现象学反对技术至上的世界观，反对建立在科学进步之上

的进步历史观，否定过去、现在、未来的线型时间划分，主张历史意义错综复杂的循环往复。21世纪涌现的交叉文化研究，依循现象学的历史诠释，力图维护文化差异的丰富性及文化碰撞的诗意价值，抵抗科技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单一文化取向与居住方式（包括当今流行的可持续性发展与绿色建筑¹²）。在这样的建筑理论大格局中，本书所探讨的比较建筑学持续关注复杂建筑语义的生成，尤其是对比喻关系中比较结构的界定，使比较成为建筑隐喻的滋生进程。本书依循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途径，从常规的形而上学的比较结构入手，寻求超越常规的比较力量，使这种力量成为推动建筑历史、理论与实践共同塑造诗意居住环境与文化碰撞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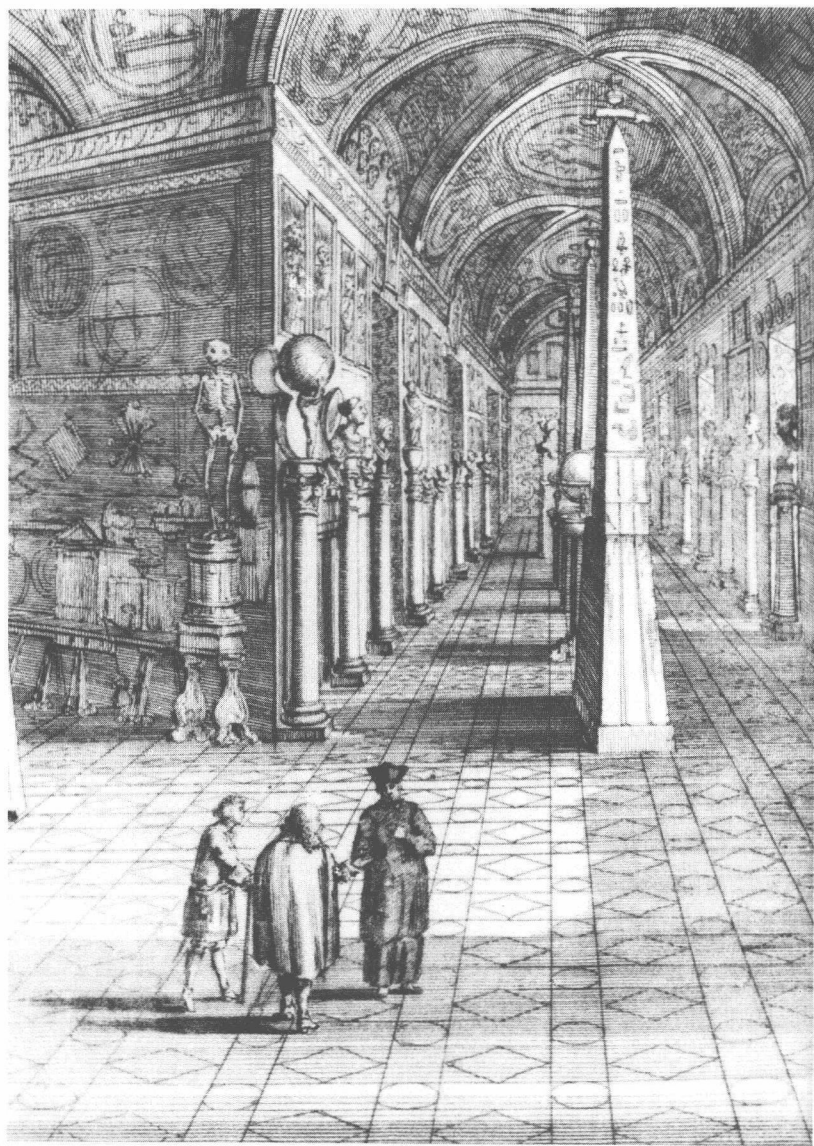
“比较”本来是一个普通的行为概念，在知识的不断演变中，出现了一系列对比较行为的演绎成果，如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美学、比较哲学、比较方法论等等。从中国的现代史发展来看，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始创了学术界对比较研究的热衷潮流。无论是这场论战中的“调和论”、“反调和论”、“西学主体论”，还是“中学主体论”，都想通过比较研究探求国家富强之路¹³。这一历史现象为比较在中国的思想发展打上了民族烙印。五四论战旨在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寻求中国的出路，林语堂在抗战时期的阅读、思索和反省则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进行个体的抗争¹⁴。时光推至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再次掀起比较热潮，以一种百废待兴的势头重构学术体系，探索赶超世界水平的道路。在这股思潮的带动下，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哲学等一系列比较学科基础理论的探讨得以展开。在比较的学术运动中，民族精神不免夹杂着民族主义。许多的比较研究案例看似热衷中西比较，但在一番比较之后总是得出西方的物质技术水平虽高，但其精神与文化水平远不如本土的泛泛结论。

比较建筑学的提出，一方面要在比较的学术大背景中被审视，另一方面必须从建筑自身的发展中得到考察。如同其他的比较学科一

样，比较建筑学承担着振兴本土建筑的责任，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可能经由文化自负的驱使，而是应该贡献于建筑自身。比较建筑学的提出在时间上落后于其他的比较学科，而且在世界建筑理论的范围内还没有被系统讨论过，这是比较切入建筑时的一个特殊现象。西方的比较建筑史观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得到显著的发展，这与以法国学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为首的百科全书运动相呼应，尤其体现在勒·鲁日（Le Rouge）编的世界园林的插图式百科全书，以及奥地利巴洛克建筑师费希尔（Fischer von Erlach）写的《历史建筑的概述》一书¹⁵。佩雷兹—戈麦兹把费希尔的建筑史称为第一部世界建筑史，说他是第一位把特定的建筑形式及其意义孤立起来，然后将诸形式并置展现出来的建筑师¹⁶。18世纪的比较观得益于17世纪巴洛克时期以西方耶稣士为先锋的东西文化碰撞。耶稣士罗马学院的教授克尔切（Athanasius Kircher）是这场文化碰撞中的多产学者，他的四十部著作中还包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专著，被当代学界誉为“什么都知道的最后一人”以及“艺术百科的大师”¹⁷。他在罗马学院建立起来的包罗万象的博物馆不仅开现代博物馆建筑的先河，而且最好地体现了巴洛克时期关于人类世界的整合的比较观。克尔切的许多著作被收藏在18世纪耶稣士设在北京的教堂。这个拥有五千多册西方文艺复兴至18世纪原版著作的文库，曾经是耶稣士积极介入中国文化的智库，并且与耶稣士在18世纪后期为清代乾隆皇帝设计的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相关联。¹⁸与西方文化的横向比较观发展相左，同期的中国文化持续着传统的纵向比较观，这从清代园林文献中大量的历史引证可以看出来。虽然我们在西方现代建筑研究中也时不时看到运用比较的个例，但是从基础理论的层次上展开对比较与建筑关系的讨论还没有被发现。具体的建筑比较研究，尤其是中西横向比较，在当代中国方兴未艾。建筑比较研究“内热外冷”的局面固然与全球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有关，也决定了比较建筑学应该摆脱本土观念的束缚，在充分

了解世界建筑的当代演变与最新发展的同时，确立自身发展的方向与策略，以自身在世界建筑理论中的被确认来推动中国当代建筑的被关注。这一目标的达成要求放眼外面的真实情况，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些什么，以根植于自身传统的独创性在世界论坛上引发评论。这个积极知道他人同时让他人知道的方式是当今中国建筑迫切需要实施的策略。

复杂的现实背景产生了比较建筑学的机会与挑战。比较建筑学的建构有可能借鉴其他先行的比较学科，同时必须从建筑思考出发，使自身在探索中成长，这意味着跨越建筑的内与外、传统与现在的界限，在心理上承受失去固有基础的安全感。建立在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上的建筑比较观，在19世纪发展成法国建筑学教授杜昂（Jean-N-L Durand）的僵化的形式主义构图手法。在其教科书中，他先把历史建筑的案例分解成若干形式“要素”，再按照建筑功能的分类把相关形式要素任意组合进新建筑的设计“构图”中。¹⁹杜昂的跨越历史时空的形式要素的并置，将语义与句法完全脱离开来，最终导致现代建筑中形式主义的猖獗。正是在杜昂的建筑理论中，主客观的整合的可能性被完全地排除在外。²⁰德里达显然对笛卡尔以来的主客体分离的思维方式感到焦虑，并关注主客体重新整合的可能性，但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可能发生在对形而上学体系的维持中。他比喻地提出，要用锤子敲打哲学家的耳朵，使他听到某种酒神的异样声音，但又不要使耳朵变聋。这种解决办法与形而上学之间不是正反题的直接对抗关系，而是一种如同耳膜的斜面结构那般的迂回缠绕关系。²¹形而上学对立双方之间界限的打破，不是靠消除对立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在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体系进行质疑的过程中寻求发展的可能与机会。这种质疑的考察需借现象学的还原消除预置的观念，又以解构的策略对传统的体系进行拆散、翻转与错位。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方法与笛卡尔的主观怀疑论划清界限，寻求真正的哲学平台，抵制哲学中的主



克尔切在17世纪耶稣士罗马学院的博物馆，铜版画，1678

图片来源：Ingrid D. Rowland, *The Ecstatic Journey: Athanasius Kircher in Baroque Rome*, 2000

观主义或客观主义的态度，发现最真实的形而上学的维向。²²德里达沿着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来建构自己的解构策略，因为胡塞尔开创了对笛卡尔形而上学传统的质疑并将其推到极致，德里达正可以借用现象学的质疑来解构现象学与形而上学的联系，即胡塞尔所称的“先验的历史性”与“意向性”。但德里达认为这种原初的历史性并不存在，它的出场被原初的差异所延迟。²³现象学与解构哲学在“历史性”问题上的分歧，导致解构主义建筑与现象学的建筑之间根本不同的历史态度。但是，现象学与解构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质疑以及对诗意存在的追寻，使它们以批判哲学的姿态相互缠绕于“抵抗诗学”的比较结构中。²⁴这里提到的现象学与解构的途径，不是想当然拿过来就可以依循的哲学方法论，它们只是参与形成了比较建筑学批判性思考的氛围。在这种氛围里面，传统意义上的目标、方法论、具体研究途径、结果等等，都在一种特别的写作进程中被延迟或消解，同时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与生机。由此导致比较建筑学的写作展开将不依循传统的因果顺序与分析逻辑，而是经由一种随机、片断的话语形式来展示对语义力量的持续追踪。每一个话语的片断都围绕着某个问题尽情而有策略地展开和延伸。通过这些诸多片断的并置与交织，有望达成对比较建筑学总体力量的把握。德里达把这种对常规的延迟以及由此涌现的非常规片断的并置与交织比喻为“捆扎”，一种由不同的意义线索相互交错而成的复杂结构。²⁵

比较这个概念很特别，一方面它必然同时包含两个比较项，这就与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结构发生对照；另一方面比较是一个动词，比什么，怎么比，能比出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入比较的进程中来思考，比较因而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不断地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确立产生延迟与间隔。比较之于形而上学的关系，恰如德里达所描述的“一种空间的打开，在其中，[形而上学的]本体延续着，但同时又被超越”。在这种打开的空间状态中，预置的目的论被消解，一切尝试

都是策略性与探索性的，这要求研究者放弃僵硬的逻辑推理，进入一种“痕迹追踪似的漫步”思维。²⁶值得注意的是，当德里达描述其（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解构”的）哲学方法时，把它称之为一种打开的空间状态。这就天然地把解构、比较与建筑纠结在相互内在的可能性中。

比较建筑学不同于建筑比较。前者是对比较、比较切入建筑、建筑内在于比较等一般性思考对象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展开讨论，后者侧重于运用比较的手段对建筑的具体问题作局部深入的剖析。比较建筑学为建筑的比较提供有效切入建筑现实的批判性与建构性策略，建筑的比较则为比较建筑学的展开提供问题的线索与思考的契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思潮以及建筑比较研究在中国的流行，为我们从建筑的角度思考比较的文化含义提供了参考。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国内建筑比较文章的分析统计，²⁷我们发现这些研究题目大多把“比较”理解为A与B的并置结构或是A与B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模式，从中可以初步把握到比较在人们心目中的隐约轮廓。从比较的运作方式看，这些建筑比较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两个对象之间的同异比较，另一类是两个对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比较。

“比较”不仅被理解为找同异的手段，同时也是一方作用于另一方的途径。在比较的展开中，不仅可以得到双方具体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同时也可以使对立方相互作用产生出某种新理解。从这些建筑比较研究的题目来看，从时间维向上可把它们划分为顺时性比较、共时性比较、顺时兼共时比较、跨时空比较四种类型。从内容上可划分为中国与外国、主题式、建筑的A方面与B方面、不同建筑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东方与西方、建筑的不同时期的演变史、建筑与建筑之外、建筑的某个正题与反题、建筑思潮A与思潮B、建筑理念与建筑师、理论与设计、建筑比较方法论、建筑比较的使命与心态等等。虽然有了以上若干类型划分，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类型互有交叉重叠，一个具体的建筑比较研究往往同时属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比较类型。再者，划

分类型并不是要让具体的比较研究只能按照事先选定的类型去展开，而是对比较切入建筑的途径进行思考的一个步骤。对现有的建筑比较研究作归纳性总结不是比较建筑学的首要任务，也不可能演绎出比较建筑学的本体，而是试图发现比较切入建筑时所暴露出的问题与不足，依寻这些问题线索展开比较建筑学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建筑比较研究形成了比较方法广泛介入建筑思考的繁荣局面，它们对于中国建筑理论的发展有贡献。在这些比较研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与独创性的成果，但许多研究案例普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比较结果之于建筑现实的有效性缺失；比较的进程缺乏有效的操作途径与策略；比较的目的缺乏对现实积极介入的主动与热情；某些比较的主观偏见强烈，尤其是民族主义倾向显著；在中西比较中缺乏对世界建筑发展的全面与最新了解，所选择的研究取向与当今世界的焦点问题无甚关系，由此导致自我欣赏的格局；对扩展建筑自身的界限作用不大，未能产生有效的创造性与批判性策略；缺乏在理论层面对比较与建筑关系的讨论，使建筑比较带有很大的无目的性与意义贫乏。概括地讲，这些建筑比较研究一方面表现了广泛的比较范围与丰富的比较对象组合，另一方面暴露出有效性不足的弱点。因此如何提高建筑比较的有效性是比较建筑学思考的重要课题。

若要使建筑的比较发挥对现实的积极作用，迫切需要在一般性理论层次上展开对比较与建筑内在互动关系的探讨。若要摆脱当今建筑比较的无效用性与意义贫乏的困境，传统的“一分析二归纳三演绎”的科学研究模式不足以揭示当代建筑艺术发展的新动向。比较建筑学呼唤自身理论建构的方法论上的更新，在打破传统框架的阵痛之中寻求自己的诞生，在质疑中确立肯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发现策略性，在自由而敏锐的思索游弋中寻找自己的归属。比较建筑学的质疑与创造的双边进程可以从对比较概念的常规定义的反思开始做起。比较建筑学是建筑学的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它的交叉学科的特征决定了其理论建